

父亲曾炳钧与清华的悠远学缘

○曾尔恕

1978年，我从张家口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父亲曾炳钧是这所学校法制史教研室的教授。1982年我毕业留校，从事教学工作至今已近40年。我与父亲既是父女，又曾经是师生，继而还是同事。父亲生于1904年，终年90岁。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大学里度过的，而其中与清华大学的学缘关系最为悠远与深厚。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父亲被录取为大学部第一届新生，那一年他21岁，入读清华政治学系。父亲三岁丧父，家境并不宽裕，在经济上除得到老家四川泸县的学业补贴外，每天下午课后在学校图书馆的助学工作以及翻译、写稿的酬劳就是他的生活来源。生活的清苦并没有阻挡父亲对知识的渴求，他读书刻苦的表现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宓先生曾在1927年的日记里记载：“他（曾炳钧）又来借书来了……”

除了读书，父亲积极组织与参加了“青年励志会”“弘毅学会”等学生社团活动，曾任青年励志会大会主席和《弘毅（北京）》刊物编辑。“弘毅学会”会章中宣示，“本学会以砥砺人格讨究学术，交换思想，以谋中国之解放与改造为宗旨。”父亲曾参加发起1928年12月7日在清华科学馆212教室召集的“边疆研究会”。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8期上的《边疆研究会缘起》表达了这个研究会成立的初衷：“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帝国主义者

挟土地侵略之野心，四面八方，步步逼通……同人等凛国势之颠危，知挽救之不容或缓，固有边疆研究会之发起。”“目的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方法。”

青年时代的曾炳钧充满朝气，善于独立思考，勤奋笔耕。1928年《国闻周报》上连载了他的《印度问题之鸟瞰》，文章对于英国的对印政策及印度的自治运动做了详尽阐述，提出“民族自决为欧战后国际间一致承认之原则”，“盖民族自决之要求，为人类本能所具有之愿望”。他与同学傅任敢、徐士瑚等创办了《认识周报》，并在该刊物上多次发表关于国际局势的评论文章，以独到的视角观察世界，大胆评论世界政治趋势，以确凿的事实与丰富的资料揭示其成因，初步显示出清华



一九八〇年曾炳钧先生与女儿曾尔恕

□ 怀念师友



一九二五年曾炳鈞攝于清華

学子的锋芒。

父亲毕业于1929年，在那一年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488—1679）逝世250年纪念日，父亲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同年，陶孟和先生倡导建立的社会调查所成立，经多位老师推荐，父亲和清华同学汤象龙被社会调查所录用。1930—1934年，社会调查所即由陶孟和与曾炳钧共同主编《社会科学杂志》。父亲在《社会科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农业理论的发展”之两种译本》《日本的农业恐慌》《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英国社会与经济政策未来十年展望》《产业革命》等多篇书评。深入社会，纵观世界，更让父亲关注的问题是国际劳工组织及国际劳工运动。1930年他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欧战前国际保工运动概观》；1932年完成了《国际劳工组织》一书，作为社会研究丛刊第十种由社会调查所出版。

《国际劳工组织》详细论述了劳工运动与产生国际劳工组织的环境、战前国际保工运动的历史、保工原则与会员国、国际劳工大会等内容，对于国际劳工组织及

其立法进行了考察和比较分析。书一经出版，就成为当时国人研究国际劳工问题的重要参考。1934年，父亲在《国闻周报》的经济时评专栏上发表了《危机日迫之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两次大战之间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十九世纪由世界经济主义转向于经济国家主义”为其显著倾向。文章对于中国经济政府的经济职能提出异议，尖锐指出其弊端。

1934年，父亲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方向是地方行政门。根据规定，公费留学生要先在国内学习进修一年，父亲的指导老师是政治学系的沈乃正教授。在为赴美学习做准备的同时，父亲还应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天津《益世报》主编钱端升先生的邀请，在《益世报》上发文。1935年上海吴淞港口，父亲和一行青年学子踏上了负笈美国的游学之路。这一行人中有后来在专业领域蜚声世界的一代宗师钱学森、张光斗等。1936年，父亲在伊利诺伊大学教授John A. Fairlie的指导下完成了《英美预算制度》的硕士论文，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L. Rogers教授指导下，于1941年以《中日冲突在英国议会中的反映》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虽然身在海外，父亲的心却时刻系念着祖国。他与中国同学往来密切，参加了清华留美同学组织的“沐社”、中国留美学生组织的“建社”。1936年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负责人沈钧儒等在上海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父亲与其他留美同学以及旅美华人随即发起签署《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沈、章、王、邹、史、李、沙七先生；请求政府确认日本为全国之公敌，救国为国民之权利及义务；请政府立刻对日



1935年赴美留学的清华学子，从前数第3排右左手扶舷梯者为曾炳钧

抗战，切实保障人民救国运动。

留学期间的父亲与学界前辈胡适逐渐熟悉，胡适先生在1938年4月17日的日记中曾记录道：“四川学生曾炳钧来谈，他是学政治的，今年专致财政。与他同吃饭。”1938年10月5日，听闻胡适先生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后，父亲即去信祝贺。信中写道：“读报得知，先生已受命出任我国驻美大使，并已行抵纽约，极端庆事！际此时危势亟，先生以学者出任艰巨，实行救国抱负；牺牲的精神，至深敬佩，除竭诚欢迎外，为默祷。”在纽约期间，父亲与清华同学王秉厚等组织过两月一次的“现代问题座谈会”，讨论国际问题。1940年钱端升先生与周鲠生先生等抵达纽约时，父亲曾以此座谈会的名义组织当地华侨和华人学生欢迎。

父亲生于1904年，在几近一个世纪中亲历了中国从国弱民贫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巨大变化。像许多中国老知识分子一样，他早已将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爱国者。1941年他在美国修完学业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寇疯狂轰炸我陪都重庆。出于抗战爱国的民族

感情，父亲放弃了在美国供职的机会，接受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签下生死状，作为唯一的中国押运员乘挪威货船S.S.Gunny号，于4月17日自纽约启程，取道大西洋、绕道好望角，转印度洋，直至7月12日抵达仰光，8月初回到昆明。在历经了生死考验的三个月后，父亲将一船新型战斗机带回祖国，投入抗战。他自己随身的物品只是满满两大木箱书，后来这些书伴随着他辗转仰光、昆明、重庆、武汉直到北京。

在回国最初的半年里，父亲在云南大学任政治经济系教授，讲授各国政治制度及财政学课程。1942年，在清华同学和老师的推荐和邀请下，父亲到重庆国民政府的经济部任参事。一年里，他研究和整理了经济部制定的抗战时期的经济管制法规，发表了《战时中国的工业与商品统制》《学术与政治》《人治与法治》等。1943年9月，他辞去了经济部参事，接受了武汉大学政治学系的聘请到武汉大学任教。

1948年2月，父亲重返母校就任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后接任了陈岱孙先生的工作担任系主任。此时清华政治学系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人员流失、教员短缺。面对困境，父亲在承担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想方设法、努力解决师资问题。心怀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及对清华政治学系振兴发展的期望，他主持制定了清华政治系发展的通盘计划。同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归入管辖范围，先于整个北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清华大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在清华大学成立的校工会里，父亲是政治学系的代表。1949年10月，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工学生代表会议的成员，他参加讨论

□ 怀念师友

了清华改革和调整的事项。他负责组织安排政治学系的师生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参与解决了政治学系教师工资按解放区薪酬计算办法换算成小米斤两数量的问题，开始进行课程体系的修订与改革，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要求新设置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课。

1951年3月，清华计划进行内部院系调整，拟将政治学系原有的行政学组及外交组改变为行政系和外交系。同年2月父亲作为中南区参观团副团长带队参观了土地改革运动，8月他参加了华北行政委员会民主建设的考察。在山西各县考察一个月后，他又担任小队队长到广西参加了8个月的土改工作。这年的10月5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父亲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问题》。这是一份在参加了华北事务部筹备县长会议的山西观察组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后的报告。在他的档案中记载着他在土改工作中的表现评语：“工作谨慎，分配田亩公平合理，沉静积极，对群众态度非常和气，而且有商量，很有民主态度，各



1982年，曾炳灼（前排右3）和中国政法大学校领导及教研室指导老师与第一届毕业的法律史硕士留影

群众非常拥护。”

1952年6月，教育部下达中央关于院校调整的通知，成立了“京津高等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被取消，父亲被调整到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由父亲的师长钱端升先生担任院长，费青教授担任副教务长，父亲入学清华大学时的政治系主任吴之椿教授，学弟陈体强、王铁崖、楼邦彦、龚祥瑞、吴恩裕及杜汝楫诸位原清华政治学教员也都被调整到这个学院。

初到北京政法学院，父亲被安排在教研组学习，1954年被分配到国家法教研室准备财政法讲义，1955年被调往国务院法制局协助整理财经法规。1956年父亲被调到国家与法的历史专业，在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成立后，任该教研室主任。父亲渊博的学识及潜心教学的努力，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被师生亲切称作“曾公”，并与吴恩裕、戴克光、严景耀几位教授并称为当时北京政法学院的“四大教授”。

1956年11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集了一次“中国法制史问题座谈会”。会上父亲提出：“目前政法院系迫切需要一部综合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教材。讲授这门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就中国的经历、从国家与法方面来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1963年，法制史教研室出版了父亲与青年教师薛梅卿合著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第一册“奴隶、封建社会部分（校内）”。这部教材是北京政法学院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法制史教材，也是新中国国内出版最早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之一。

在学术研究上，父亲提倡争论，认为“从争论中发现真理，推动真理，正是辩

证唯物主义的发展”。1981年父亲与法制史教研室的老师们合力编纂了《历代冤案平反录》。父亲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如果从本书中可以得到什么启发的话，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要不断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反对个人专断，反对以言代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反对任何人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建设一支通晓法律、刚直不阿、廉洁奉公，敢于以身殉职、以身殉法的无产阶级司法队伍；反对屈从权势，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要在审判实践中开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草率从事；严禁逼、供、信。”

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复校后，父亲担任法制史专业导师组组长并直接指导了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中国法制史硕士研究生。1980年中国政治学第一届年会上他被推选为副会长，1982年第二届年会上被聘为顾问。那时的父亲虽然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但仍坚持参加教研室的会议，关注学校的进步与发展；他常在家里接待师生，认真地与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他热忱而严格地指导研究生，督促他们多读书并要求写读书笔记；他克服由于青光眼而造成眼力困难，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地为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1987年，父亲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法学博士的论文答辩。我留校任教后，有一次在教学楼四楼上课，讲课之间忽然发现教室最后一排竟坐着父亲！他从头至尾听了我的课，并且在课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那时他已经82岁了，我不知道他是

怎么知道那天我有课，又是怎样拄着拐棍上的四楼。他说过多次，教书不光要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就如同不仅要给求金者金子，更重要的是教会他点金术。

父亲一生忧国忧民，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进步，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关注，即便在“文革”迫害的高压下也不例外。“文革”后，百废待兴，父亲经常在家里和政法学院的老同事讨论世界形势，议论国家大事和学校的建设，他们学贯中西，谈古论今，抨击时弊，高谈阔论的形象我至今不忘，历历在目。父亲在85岁高龄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入党的申请书里这样写道：“十年浩劫，国家和个人均遭大难，几濒绝境，幸拨乱反正，国家转危为安，重又走上大规模建设的坦途……我自知年事已高，岁月无多，能力有限，贡献不大。但自信报国之志不衰，奋发之心未眠，他无所求，但愿在有生之年作为党的一个成员尽可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的光辉事业、革命目标奋斗到底！”

1994年，父亲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先是住北医三院，后医院认为他的心脏病已无药可医不再收治，不得已转到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住了一周。天意让我们联系到父亲母校的清华校医院，念及他是清华老人，校医院同意接收。父亲住进校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后，我俯身告诉他：“爸爸现在在清华校园里，窗外就是荷塘。塘里的荷花都开了！”他听后点头，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归去来兮，一个世纪的一生，父亲的学者生涯始于清华，终于清华。

2021年3月3日